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那高尚的梦想

“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

[美] 彼得·诺维克 著 杨豫 译



K097. 12/1

2009

西学

源流

[美] 彼得·诺维克 著 杨豫 译

那高尚的梦想

“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 /
(美) 诺维克著；杨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9.2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3008-5

I. 那… II. ①诺… ②杨… III. 史学史－研究－美国
IV. K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7082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3-58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28.875

字 数 730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西学源流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

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年元旦

献给 V. J. Z.

曾经，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为，我们可以看到……大批可信而可靠的……美国史著作……将烘托出一种明确的理念，那就是努力追求客观真理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德国，然后又被各国所接受。可是，一年前，有人（查尔斯·比尔德）声称这种公正的理念纯系乌有。……历史学家们为之奋斗了五十年，到了最后，这一根本理念却被完全地抛弃了。不带任何偏见地探索真理……突然被宣告是不可能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作者抛弃了公正性，理由是它主张袖手旁观，或违背了社会信念，或缺乏教育意义，或者说连最粗糙的社会哲学都不如。

也许，再过五十年以后，人们将会看到历史学一个时代的终结，高尚的梦想将最终破灭，历史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除非它变成娱乐的工具或社会控制的工具。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历史学会将要解散，因为它成立时奠定的知识主张已经荡然无存。尽管如此，我仍抱有这样的希望，我们这些人将会以一种似乎处在古怪的信念和忘却了的忠诚的时代而被人们怀念着，但我们仍将把这面飘扬着的旗帜传递下去。

——西奥多尔·克拉克·史密斯

1934年

前　　言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他们是芝加哥大学人类科学史研究所（Workshop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这个模范学术团体的基思·贝克（Keith Baker），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扬·戈尔德斯坦（Jan Goldstein），鲍布·理查兹（Bob Richards）和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还有一些人读过我的部分原稿并提出了批评建议，其中包括戴维·阿布拉罕（David Abraham），苏珊·弗兰克（Susan Frank），吉姆·格罗斯曼（Jim Grossman），哈里·哈罗奥图尼安（Harry Harootanian），唐·列文（Don Levine），唐·麦克克洛斯基（Don McCloskey），比尔·麦克尼尔（Bill McNeill），琼·诺维克（Joan Novick），多萝西·罗丝（Dorothy Ross）和劳伦斯·维齐（Laurence Veysey）以及其他未署名的评论者。芝加哥大学内外的许多朋友向我提供了资料，通过他们，我形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想法。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但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学术惯例上还有一种表示感谢的方式，那就是在脚注中的文字“关于某个问题的研究，请参考……”之后开列出他们的书目。我在本书的几乎每一页的脚注中都开列了相关的书目，并从如此之多的书中获益不浅。只有少数情况例外，那就是我的研究与这位作者的著作几乎同步。我相信这一省略不致会引起人们以为我心胸狭窄。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访问过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员给了我非常有益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我的研究工作。在

此，我应向他们致谢。此外，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弗兰克·S. 史密斯（Frank S. Smith）。他确实是一名出色的编辑。当然，我还要向本书的另外两名编辑表示谢意。他们是詹姆斯·波尔斯特（Jams Bolster）和南希·兰道（Nancy Landau）。

这里，有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加以说明。我在本书的正文和脚注中使用了一些学术组织和刊物的名称缩写。AHA 指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R 指《美国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MVHA 指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学会（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Association），MVHR 指《密西西比河谷史学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它们更名以后，OAH 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JAH 指《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在引用档案时我尽量做到准确，但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档案尚未整理完毕（至少在我使用时尚未整理完毕），因此无法给出准确的出处。如果要完整地说明这些手稿资料的收藏地点，需要较多的文字，将大量增加脚注的篇幅。因此，我使用了缩略的形式并在书末的附录中详细列出了本书使用过的这些档案的案卷目录。我不止一次说过，在引用的时候，斜体字表示“原文如此”，因为在引文中，用斜体字表述的文字都是原文，不得改动。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拘泥标准的学术惯例。在引用信件的时候，在保证原意清楚的前提下，我纠正了一些拼写和标点符号。由此看来，这样的引文如果再附上“原文如此”（[sic]）的字样，似乎就有失恭敬了。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做不到的事情 1

第一篇 客观性的加冕

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兰克，培根和福楼拜 27

第二章 职业化的计划 64

第三章 共识和合法性 82

第四章 最优雅的反叛 116

第二篇 受围困的客观性

第五章 历史学家在后方 149

第六章 风云突变 180

第七章 职业化的停顿 230

第八章 分歧和反叛 282

第九章 交战 342

第三篇 客观性的重建

第十章 为西方辩护 385

第十一章 趋同的文化 438

第十二章 自主的职业 495

第四篇 客观性在危机中

第十三章 分崩离析	567
第十四章 每个人群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640
第十五章 中央失守	712
第十六章 以色列无国王	783
附录 本书引用的手稿集	861
索引	865
出版后记	912

导论 做不到的事情

1

职业历史学的核心是“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它是这项事业的基石，也是它继续存在的理由。在美国历史学界，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历史著作要获得奖励和称赞，这一品性是首要的标准。衡量历史学的学术进步，对过去的描述是否越来越趋近客观的真相，它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职业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工作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期望？也就是说，他们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如何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应当如何做这些事情？任何人，只要对此发生兴趣，首先想到的就是“客观性问题”。

一个世纪以来，客观性观念在美国历史学界遭遇的命运，正是我在本书要探讨的内容。本书将叙述客观性观念的形成、修正、遭遇的挑战以及得到的捍卫；本书还要讨论这一观念以什么方式推动了（或有时阻滞了）职业化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当然，美国历史学家还有其他的价值观，面临着本身的任务。这些因素有时对实现客观性的目标起着补充的作用，但有时也起着相反的作用。这些也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我将尽力理清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如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一代又一代的职业历史学家所起的推动作用。

“历史客观性”并不是单一的观念，而是各种主张、态度、愿望和憎恶相互纠缠在一起构成的集合体。哲学家 W.B. 加利克 (W. B. Gallic) 称它为“本质上存有争论的一个概念”，就像“社会公正”或“过着基督教徒式的生活”等概念一样，它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永远存在着争议。

构成客观性观念的主要成分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可以做一个扼要的归纳。它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忠于过去的事实，忠于与过去的事实相吻合的真理；把认知者和被认知的对象、把事实与价值观，特别是把历史与虚构截然区别开来。根据这个观念，历史事实不仅高于历史解释，而且独立于历史解释：要判断某个历史解释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说明了事实。如果它与事实相违背，必须将它抛弃。客观性的观念坚持真理只有一个，而且不受观察角度的支配。历史模式，无论是否存在，都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作的”。虽然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随着各自观点的变化有可能赋予过去的事件以不同的重要性，但这些事件内在的意义是不可改变的。

坚持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一位坚守中立或公正不阿的法官，决不能退化为鼓动者或更糟糕的宣传者的角色。历史学家做出的结论应当体现出司法的典型特征，平衡和公正。像司法一样，这一特征要得到维护必须不屈服于社会压力或政治影响，每个历史学家都必须避免带有任何党私偏见或倾向，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不得考虑任何个人利益，而不是相反。如果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怀有功利的目的，便把客观性推到了十分严重的危险境地。从以上的概括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学家，当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必须放弃对历史学以外的任何忠诚：历史学家只能对“客观的历史真相”表达最高的忠诚，对历史学界的同行们表示最高的忠诚，而同行们则必须下定共同的决心，开展合作，通过积累性的努力，不断

地走向客观性的目标。

对客观主义最初提出的和一直坚持下来的原理所做的这一归纳，显然是高度浓缩的，但我认为也是完整的。客观性是个理想，要靠每个历史学家去追求，又要靠集体来维护。一百多年来，构成这个概念的某些重要成分多次被人们重新构造，或重新解释。现在，对于历史学家是否有能力完全排除价值观的影响，即使是客观性思想最坚定的支持者，无论他们所受的训练多么严格，也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信心不足。由此产生了一个趋势，越来越倾向于把客观性置于批评和评价的社会机制的基础之上，不再依赖个人的素质。尽管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还会提及“不带先入之见”地去接近过去的真相，或“让事实自己说话”这样一些话题，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却越来越少了。相反，历史学家们以更宽容的态度对待假设，他们更加强调历史解释应接受事实的检验，而不是从事实中获得的历史解释。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个趋势，他们把驶向真相看作是一次集体航行，每个历史学家都在搭船航行，但不是直线驶向那个最终的目标。最近，他们在谈到“知识的增长”时指的往往是为知识大厦辩证性地而不是永久性地增加一块又一块砖瓦。尽管“客观性”这个词的含义近年来不时被修正，但传统的用法依然属于强势，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历史学家最初提出的实现客观性的纲领，无论从其基本内容还是从指导方向而言，依然有着十分持久的生命力。

在定义某个概念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用它的对立面来界定。³ 在19世纪，“客观性”往往是针对“主观性”而言，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客观性”的对立面却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这个概念并非表达一种明确的立场，而是指一种批判的态度。它所针对的是客观主义综合观念中的各种成分，在通常的情况下，相对主义是指一种怀疑的态度，怀疑客观性的观念在历史学中的运用是否具有一

贯性。①

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不准备过多地讨论历史客观性的思想，但会提供有关这一思想的大量信息。研究客观性思想的一种方式是把它当作“神话”来考虑。当然，“神话”这个字眼可以带挑战的含义，尽管这样的用法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今天，学术界的基督教徒仍然经常谈论基督献身救世的神话。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经常谈论无产阶级身负解放使命的神话。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神话都没有“谬误”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们坚持的事业值得怀疑。我在使用“神话”这个词的时候，与当前的习惯用法一样，并不是要说明所讨论的对象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而是用它来说明“历史的客观性”在维护职业历史学的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从定义上讲神话有神圣的含义，所以只有在与固执和凶残的对立中它才能得到维护。

一类神话是“创世纪的神话”：米尔塞·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一本书中写道，神话是对“创世纪的复述；它叙述万物如何成就，即它的开始出现。它……只说事实，说真实发生的事情，充分展现出来的事情”。神话叙述的事实是神性的事实：“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中的事实，不同于‘自然的’（或‘世俗的’）事实。……在后一种事实中，填充它的东西……相当于力。”②

任何新的认知结构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其认识论的基础合法化。这有可能要涉及天才和英雄的个人神话，往往用他们的个人性

① “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相对主义者”（relativist）通常是客观主义观念的捍卫者给批评者贴上的一个标签，而批评者从不自称“相对主义者”。这些标签已经贴在了一些历史学家身上，进入了历史学家使用的语汇，因此我也使用它们。直到几年前，历史学家仍很少使用“客观主义”（objectivism）和“客观主义者”（objectivist）等词语，连哲学家也不大使用它们。出于这个理由，何况在使用新术语的问题上我比较保守，因此过去往往加以抵制，不愿意使用这两个概念。不过，由于当前的需要，我还是最终克服了自己的抵制心理，因为如果要写一本长达数百页的关于基督神性的信仰和信徒的著作，要是通篇不使用“基督教”或“基督徒”这两个词的话，显然是极为困难的。

② 《神圣的和世俗的》（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New York, 1959: 95）。

格作为例子，来说明获得新知识的方法。比如，对牛顿的崇拜和对弗洛伊德的崇拜就属于这类神话。前者的名言有“不敢知道”，后者则以英雄的方式在分析自己的梦境中征服了焦虑。文化人类学的认识论完全依据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提出的神话。他说，必须具备将自己置于文化之中的魔术般的能力，一旦充分具备了这种能力，就能“从内部”来描述这一文化。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也提出了一种神话，关于探索者不受价值观支配的神话。这种探索者只对“事实”感兴趣的神话在美国史学中可以发挥相同的作用。任何认识结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神话，便失去了基础和权威性。至少，对于鼓舞普通读者以及职业实践者的士气来说，这些神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必须要让他们相信这门新学科所提供的知识比以前更为优越。例如，19世纪的职业历史学家相信，他们手中的玩意儿比绅士业余历史学家们写的“党派”著作或“有偏见的”著作更优越，尽管后一类历史学家至今仍在美国史学界占据着统治地位。⁴

不过，对神话的关注不仅是为了说明起源问题，也期望它在今天这个时代发挥作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之于当代社会机构就像是一张团体执照，与社会和文化环境有紧密的关系。神话“并非仅是口传的故事，也是生活中的现实……它表达和增强了信仰并将它系统化；维护和增强道德标准；确保仪式的有效性，是强制性的指导人类行为的实用规则”。从这个观点来看，历史客观性的神话所发挥的作用是确保和增强学术公正的规范，保证学术“仪式”的有效性，例如历史学家必须“清除自己头脑中的预设”，必须严格遵守查证和考证史料的程序，严谨地使用档案等等。^③

^③ 布伦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原始心理状态中的神话”（Bronislaw Malinowski,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in his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Glencoe, Ill, 1948: 78—79）。